

# 欧 洲 观 察

2012 年第 4 期·总第 83 期

上海欧洲学会

2012 年 4 月 1 日

学术探讨

## 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 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分析<sup>1</sup>

王传兴

**[内容摘要]** 国际体系变迁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界定标准的差异，国际体系变迁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区分。本文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是以时空标准来进行区分的。由于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存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连接关系，因而这种归类有助于避免机械地将“体系本体转型”与“体系要素转型”割裂开来。在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不同——同质性与异质性——国际行为体之间，其结构性权力变化、结构性权力的持续时间和稳定性、以及结构性权力来源领域的相对重要性等，在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充分体现了这种差异。如果当今正在发生的是又一次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即从现代国际体系到后现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那么其对新型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结构性权力变化

**[作者简介]** 王传兴，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

在当今的时代嬗变过程中，人们一如既往地尝试着以某种简洁的模式或框架来对之进行总体描述。基于根本假定的理论化归纳、也即概念化，因而成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世界最基本的工具。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冷战的结束这两个看似互为偶然的事件，实际上却在其中蕴含当代国际体系变迁的重大意义。这促使我们对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变迁进行深入多角度的思考。

<sup>1</sup>本文是同济大学“98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课题“国家结构实力研究”和同济大学“985 工程”“全球变化与中国国家利益研究”课题的中期成果。衷心感谢《欧洲研究》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批评意见和建议；如果本文中存在问题，完全由本文作者负责。

## 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

我们知道,“国际体系是世界政治基本单元之间的关系模式,其特点表现为这些单位所追求目标和它们之间任务执行的范围,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和执行这些任务所采用的手段。决定这一模式的乃是世界的结构、主要单元之间或其内部的力量性质,它们的能力、权力模式和政治文化。”<sup>2</sup>长期以来,国际体系一般被定义为国家间体系(interstate system),而且人们“如今已根深蒂固地将这两个概念等同看待。”<sup>3</sup>换言之,作为现代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国际行为体,乃是民族国家。不过在世界历史中,我们“将国际体系一般看作是用来指构成国际关系主题的行为体及其互动网络。”<sup>4</sup>这是一种以“长达五千年中由多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构成的整个历史”<sup>5</sup>为基础而进行的研究。因此,在世界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各种国际体系基本行为体,其实并不仅限于民族国家,而是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例如,在古希腊、古代东亚和中世纪欧洲的国际体系中,基本国际行为体分别是城邦国家、宗主国与藩属国、以及教会与帝国等。

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将国际体系区分为不同类型,例如,K. J. 霍尔斯特(K. J. Holsti)根据体系结构将国际体系分为五种类型——等级型、扩散型、扩散-集团型、极模式型和多极体系型,<sup>6</sup>乔治·莫德斯基(George Modelski)认为根据功能要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可以将国际体系分为农业型国际体系和工业型国际体系<sup>7</sup>等,从而有着不同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

秦亚青在研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约翰·鲁杰(John Ruggie)和英国学派国际体系理论等的基础上归纳道,“国际体系转型研究主要包括两类理论,一类是研究体系本体转型,另一类是研究体系要素转型。前者指体系本身发生变化,后者指体系内部结构发生变化。”<sup>8</sup>基于此,如果我们以时间和空间标准来衡量,则在世界历史中国际体系变迁存在着两种基本类型,即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和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sup>9</sup>共时“是在同一个时期内存在的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历时“是在时间之中一个要素为另一个要素替代”。<sup>10</sup>此处的“要素”即指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元的国际行为体。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是在现存国际体系之内发生的,即作为一定时期的国际体系“要素”(指“基本单元”)的现有国际行为体并没有被新型国际行为体所取代、或与之并存;其特点是

<sup>2</sup> Stanley Hoffmann,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edited by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07.

<sup>3</sup>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5-6.

<sup>4</sup> Ibid., p5.

<sup>5</sup> Ibid., p1.

<sup>6</sup> 参见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Prentice-Hall, Inc., 1988, pp86-88.

<sup>7</sup> 参见 George Modelski, "Agraria and Industria: Two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23.

<sup>8</sup>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2页。

<sup>9</sup>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讨论,可参见薛力所撰写的《从结构主义到国际关系理论:一项系统的考察——兼论华尔兹结构观的局限性》一文,《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29-40页。本文中的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和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只是借用了薛文中所论及的“共时性”(synchrony)和“历时性”(diachrony)两个概念,内涵并不一定与薛文中完全一致。——本文作者注。

<sup>10</sup> 罗菲:《对索绪尔语言研究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探讨》,《科技信息》,2008年第3期,第88页。

国际体系内部要素——此处的“要素”指的是“体系结构、体系制度和体系文化”<sup>11</sup>——的变化。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是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国际体系之间发生的，作为体系基本单元的旧有国际行为体已经被新型国际行为体所取代，或与之并存；其特点是“体系单位性质的变化。”<sup>12</sup>

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体系内部要素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催生体系本体的变化。”<sup>13</sup>无论是“体系本体转型”还是“体系要素转型”，这二者并非各自割裂开来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通过以时间和空间标准来对国际体系转型进行区分，我们可以对国际体系变迁进行有机的动态观察，而非机械的静态区隔。换言之，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是时间和空间二者共同的变化，而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是同一时间维度下的空间转化。这二者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变化，而是相互关联的。历时性变迁内部总是包含共时性变迁的，而共时性变迁的积累有可能导致历时性变迁。因此，采用这种时空区分标准，可以避免将“体系本体转型”与“体系要素转型”机械地割裂开来。

### 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

权力“意味着一个人对他人行动和思想的控制；我们用政治权力来指公共权威拥有者之间及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控制关系。”<sup>14</sup>国际关系中有关权力的分类很多，如硬权力和软权力等。苏珊·斯特兰奇将权力区分为联系性/结构性权力：<sup>15</sup>

“联系性权力就是甲靠权力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做的事。……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他国家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同样重要的是)科学家和别的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些结构中活动。……结构性权力不知是指确定议事日程或(用美国学者的术语来说)设计”包含了支配国际经济关系的惯例和国际体制。这是结构性权力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简而言之，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sup>16</sup>

结构性权力分别来源于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等“四种基本结构”领域，以及作为其辅佐的运输、贸易、能源、福利、国际法、粮食等次级结构领域。<sup>17</sup>

必须指出，本文中的结构性权力与权力结构是两个具有根本区别的不同概念。作为整个体系的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它“可以指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可能性是用‘权力结构’这一术语来描述赋予像A这样的行为体对B那样的行为体权力的某种安排。也就是说，

<sup>11</sup> 参见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5页。

<sup>12</sup>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4页。

<sup>13</sup> 同上，第6页。

<sup>14</sup>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Alfred A. Knopf, Inc., 1973, p32.

<sup>15</sup> 另有学者认为，“联系性权力是一个国家直接影响另一个国家行为的能力，而结构性权力则指一个国家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途径是通过控制那些国家必须在其中活动的国际结构。”见 Eric Helleiner 的文章“Structura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http://ksuanth.wetpaint.com/page/Hard+Power+Soft+Power+%26+Structural+Power>。

<sup>16</sup>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sup>17</sup> 同上，第146页。

我们将‘权力结构’等同于人们所知的‘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基础。”<sup>18</sup>国际体系“结构性权力可被简单定义为‘源于结构中所处地位的权力’。这一术语的用处在于它强调了权力基础要素不仅可以是资源，而且可以是结构地位。”<sup>19</sup>而人们通常理解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另一层含义，则指的是其“组成部分(体系单元)之间的权力分配。”<sup>20</sup>

强调这种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对体系权力结构的描述莫过于对其组成部分权力的描述”，<sup>21</sup>那么结构性权力则是“讨论权力基础问题。”<sup>22</sup>如果说国际体系权力结构讨论的是体系内单元权力的分配情况，那么斯特兰奇所说的“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则讨论的是“体系中一套规定谁应该服从谁的规范(norm)”<sup>23</sup>这一问题。“这样的规范赋予某些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的权力，如A对B的权力。”<sup>24</sup>例如，我按照公司总裁或执行经理的吩咐办事，“是因为他有权指挥我——一个中层经理或商店职员。”<sup>25</sup>换言之，最有经济权力的“是一些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层次和控制网络的的公司或国家企业，通过这些层次和网络它们作出的主要是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性的决策。”<sup>26</sup>

这样的区分还意味着，如果在讨论国际体系变迁时的出发点是沃尔兹式的体系内权力分配状态及其变化，那么国际体系“结构还可以突然变化。”<sup>27</sup>国际体系内单元的权力分配变化因而似乎是发生了一场革命。冷战的结束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内特定单元(如苏联/俄罗斯)权力变化即是例证。

而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出发，由于行为体在国际体系内的权力是源于赋予其权力的“某种安排”，因此行为体在体系内“源于结构中所处地位的权力”变化，必然是一个渐进性而非革命性的过程。二战后美国在全球金融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从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与黄金脱钩、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所体现的美国金融结构性权力变化<sup>28</sup>——即是例证。

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基于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进行观察可以发现，结构性权力变化在共时性/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首先，由于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的主要特点是“体系内要素转型”，因此结构性权力关系的变化只是发生在同一时间维度(现存类型的国际体系)中的空间转化(现存类型国际体系中基本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结构性权力变化)。例如，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时间维度中，曾发生“从英国到美国这样一种全球支配结构”<sup>29</sup>的变化；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体系的时间维度中，曾发生斯巴达与雅典之间支配结

<sup>18</sup> Kjell Goldmann, "Notes o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77, 12:1, p8.

<sup>19</sup> Ibid., p9.

<sup>20</sup> Ibid., p8.

<sup>21</sup> Ibid.

<sup>22</sup> Ibid.

<sup>23</sup> Ibid., p9.

<sup>24</sup> Kjell Goldmann, "Notes o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77, 12:1, p9.

<sup>25</sup>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sup>26</sup> 同上。

<sup>27</sup>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p70.

<sup>28</sup> 具体体现为：固定汇率制——美元定值为每盎司黄金35美元，其他国家的政府将其货币与美元的比值固定；以及西方七国在IMF拥有44.39%投票权(其中美国拥有16.74%投票权)，而IMF的主要决定需得到85%以上投票权才能获得通过，因而美国一家就拥有否决权——(2010年4月之前，美国拥有17.3%投票权、北美和欧洲拥有的投票权加起来超过50%)，美欧分别垄断世界银行行长和IMF总裁一职。——本文作者注。

<sup>29</sup> 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1页。

构的变化——巴达因而担心与雅典之间“战争不可避免”<sup>30</sup>。而由于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的主要特点是“体系本体转型”，因此结构性权力关系的变化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维度（现存类型的国际体系与新型国际体系）中的空间转化（现存类型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国际行为与新型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结构性权力变化）。欧洲历史上由中世纪欧洲国际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的变迁即是一例，“它与此前的古典文明截然不同。”<sup>31</sup>

第二，结构性权力变化在历时性/共时性这两种不同类型国际体系变迁之间，还表现为其持续时间长短和稳定性的差别。相较于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国际行为体的结构性权力持续时间一般更短、因而稳定性也相对较低。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只持续了约半个世纪，而作为整体的西方（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元——民族国家——首先出现的地方），其中世纪欧洲-现代国际体系历时性变迁中获得的结构性权力则一直持续至今。因此，相对于由国际体系本体变迁所导致的异质性国际行为体（如欧洲中世纪教会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结构性权力的变化，国际体系要素转型所导致的同质性国际行为体（如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之间结构性权力发生变化的频度一般更高、因而也更不稳定。

第三，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和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结构性权力的来源领域及其相对重要性并不一致。相对于安全、生产、金融等基本结构领域以及那些次级结构领域，知识基本结构领域在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的结构性权力变化中具有主导性作用；而在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则不明显，尽管这丝毫不会否定其在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在知识领域的三个层次——信仰（以及由这些信仰衍生的道德观和道德标准），知识和理解，以及信仰、观念、知识的传送渠道<sup>32</sup>——中，“知识结构衍生的力量常常在于否定知识、不让其他人获得知识之中”。<sup>33</sup>以信仰、观念、知识的传送方式——如叙述话语——为例，由于“叙述远非仅仅只是可以填塞不同内容的话语形式，……叙述在任何特定言语或写作具体化之前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内容”，<sup>34</sup>因此在对世界的叙述过程中，对相关信仰、观念、知识的叙述因此就无疑拥有了足够的知识结构性权力。而这是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所产生的结构性权力得以长期稳定维持的根本原因。

对于以上的比较结果，世界历史中有众多这样的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个案。在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汉朝-匈奴两极格局的形成和崩溃表明，汉朝最终获胜并终结两极格局的根本原因，乃是因为农业帝国汉朝享有安全和生产结构性权力，其中特别是安全结构性权力。<sup>35</sup>贸易结构性权力在古希腊城邦国际体系中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柯林斯城邦代表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宣称，“那些在内陆或远离贸易通道者应该承认这一事实：如果他们不支持（罗奔尼撒同盟的）海洋国家，他们将发现要确保其进出口贸易的出入安全将困难得多。”<sup>36</sup>

<sup>30</sup>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nguin Books Ltd., 1982, p23.

<sup>31</sup>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Routledge, 1992, p138.

<sup>32</sup>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sup>33</sup> 同上。

<sup>34</sup>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xi.

<sup>35</sup> 参见孙力舟在《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分析——基于汉朝和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的考查》一文中的相关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第17-25页。

<sup>36</sup>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nguin Books Ltd., 1982, p104.

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我们也选取两个个案。其一，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形成过程中，鉴于东亚各国之间互动规模和程度相对有限，因此中国所享有的结构性权力更多源于知识结构领域，而非生产和金融结构领域、甚至也不是安全结构领域：由于权力最终将给予在知识结构中占有关键决策地位的人，“给予被委托储存知识和给予控制着传递知识或信息途径的人”，<sup>37</sup>所以“重名轻实、重礼仪轻物质”为特点的东亚朝贡制，就是要“靠声威与德化的感召”力来使他者归附。<sup>38</sup>其二，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知识结构性权力核心的信息结构性权力，正日益成为（可能）正在发生的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具有决定性的结构性权力。

总之，国际体系变迁意味着新的结构性权力开始在新的国际体系中逐渐形成。无论是在共时性还是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就结构性权力而言，拥有结构性权力的国际行为体都将在其中处于相对长期稳定——如上文所言，这种“相对长期稳定”在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中存在差异——的支配地位，因为它（们）能够“对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体系互动进行组织协调：一方面对经济政治力量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对塑造公共思想、价值和信仰的意识形态进行发号施令。”<sup>39</sup>

### 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

我们现在重点讨论现代历史上发生的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所导致的结构性权力变化。首先，从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的角度来看，由欧洲中世纪国际体系到现代全球性国际体系（即现代国际体系）的现代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是在公元 1500 年左右“一种新型占主导地位的单位（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sup>40</sup>之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现代世界体系源于 16 世纪——即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所称的从 1450 年至 1650 年那一‘漫长的’16 世纪。在此时期形成了欧洲的世界经济，其结构与世界上此前的任何结构都不一样。”<sup>41</sup>在从欧洲中世纪国际体系变迁为欧洲现代国际体系、以及现代欧洲国际体系从 17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三个世纪里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一个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过程。因为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元的国际行为体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先于这一国家体系之前的东西，在理论上是一个单一管辖单元的基督教世界，里面有“组成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众多王国、封地和城市……。”<sup>42</sup>

这种现代历史上国际体系本体转换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历史上异质性国际行为体（现代民族国家之于前现代全球各地的教会、帝国、王国、封地等）结构性权力的转移。自‘漫长的’16 世纪以来，欧洲（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以下简称“国家”）在这次现代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逐渐获得了长期稳定的结构性权力。在现代国际体系取代前现代国际体系之

<sup>37</sup>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5—26 页；第 125 页。

<sup>38</sup>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 7 页。

<sup>39</sup> William A. Haviland, Harald E. L. Prins, Dana Walrath, Bunny McBride, *Anthropology: The Human Challenge* (13<sup>th</sup> editi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11, P686; or “Hard Power Soft Power & Structural Power”,

<http://ksuanth.wetpaint.com/page/Hard+Power+Soft+Power+%26+Structural+Power>.

<sup>40</sup>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217 页。

<sup>41</sup> Immanuel Wallerstein, “Three Path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Phil Williams, Donald M. Goldstein, and Jay M. Shafritz, eds.,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95.

<sup>42</sup> Martin Wight, “Powers: A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illiam C. Olson,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ntice-Hall, Inc., 1987, p17.

后，在安全领域关于“谁向谁提供安全？”<sup>43</sup>或“谁给谁带来不安全？”这样的问题，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欧洲（西方）国家相信，“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安全权力，并因此有权利期望弱邻甚至牺牲自身的安全来为安全做出贡献”；<sup>44</sup>事实上，“西方文化地位的上升……是通过军事冲突和征服（来实现的）。”<sup>45</sup>在生产领域，随着现代国际体系的扩展，对于“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方式生产和按什么条件生产”<sup>46</sup>之类的问题，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00年左右的时候，“构成世界35%人口的欧洲人、北美人和大洋洲人消费世界62%的产出”<sup>47</sup>——足以显示西方世界所享有的生产结构性权力。在金融领域，就金融结构的两个方面——信贷得以建立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包括货币体系或确定作为信贷计帐单位的不同货币汇率的体系<sup>48</sup>——而言，187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金本位和英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sup>49</sup>以及1945年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现了西方国家的金融结构性权力。在知识领域，西方国家主导着对相关信仰、观念、知识叙述的知识结构性权力。限于篇幅，在此不对西方国家在运输、贸易、能源、福利、国际法、粮食等次级结构领域所享有的结构性权力进行逐一评析。

历经数个世纪，欧洲（西方）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享有决定性的结构性权力，从而确立了自己在该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受到挑战已经有相当时间了，因为“至少在20世纪，西方文明已陷入衰弱。”<sup>50</sup>具体而言，一方面，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表明欧洲（西方）国家丧失了其曾绝对享有的安全结构性权力；目前，欧洲（西方）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支配地位受到的实质性挑战，如果不是全面性的，至少也可以说是来自多领域。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支配地位所受的挑战只是相对的，因为它们拥有的支配性结构性权力地位依然相对稳定。

如果说现代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主要关注的是区域间不均衡——西方与非西方——的话，那么作为体系要素转换形式的现代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则主要关注现代国际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同质性国际行为体（民族国家）之间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即现代国际体系——得以先在欧洲建立并逐渐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共经历了欧洲体系（17世纪）、西方体系（18世纪）、正在全球化的体系（19世纪）和全球体系（20世纪）四个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的不同阶段，直到这一国家体系“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完全全球性的。”<sup>51</sup>现代国际体系的共时性变迁因而经历了区域性和全球性两个不同阶段。在现代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获得结构性权力

<sup>43</sup>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sup>44</sup> David Gillard, "British and Russian Relations with Asian Governmen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90.

<sup>45</sup> Michael Howard, "The Military Factor in European Expansion" i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4.

<sup>46</sup>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sup>47</sup> Patrick O'Brien, "Europe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3.

<sup>48</sup>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sup>49</sup> Thomas D. Lairson, David Skidmor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wealth*,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53.

<sup>50</sup> 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utledge, 2003, p66.

<sup>51</sup>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 Sø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8.

的国家都能够相对长期稳定地在现代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占支配性地位。在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的现代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虽然拥有结构性权力的国家众多,包括英、法、奥、普、德、俄等,但真正拥有全面结构性权力的国家则只有英国;在 20 世纪的现代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虽然前半期拥有结构性权力的国家包括美、英、德、苏、法、日等国,后半期拥有结构性权力的国家包括美国和苏联,但真正拥有全面结构性权力的国家则只有美国。

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现代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因为获得结构性权力的国家都在欧洲,其中英国更是首屈一指。例如,<sup>52</sup>18 世纪的英国凭借产业革命的先机,最终确立了在安全、生产、金融 and 知识等领域的结构性权力。结果,英国在现代国际体系变迁中维持了两个世纪(18—19 世纪)的支配地位。在安全领域,由于英国是工业革命时期世界上走在最前列的国家,因此它“能够捍卫自己、并能够获得和保持其新的能力所带来的利益。”<sup>53</sup>在生产领域,1870 年英国工业生产占全球的 32%,紧随其后的美德两国加起来占全球的 36%;在金融领域,1870 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占全球的 61%(1914 年依然高达 44%),英镑的准世界货币地位得以确立;在知识领域,英国是主要的技术输出国,并且“英国企业家迅速采用了新的生产技术。”<sup>54</sup>

《幸福》杂志发行人亨利·鲁斯 1941 年的“20 世纪是‘美国世纪’”<sup>55</sup>宣言,昭示了美国在现代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结构性权力地位的变化。正如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占得先机一样,美国也是通过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先知先觉”,再辅之以先天的地理优势和精心的对外战略规划,从而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等领域获得了全面的结构性权力。不同于英国,美国很好地“适应了以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以科学为基础和专业化管理的公司”<sup>56</sup>为特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它能够在新的产业——炼油业、食品加工业、大规模生产的轻型机械和电子设备产品等——中大显身手。结果,二战结束以来,在安全领域,美国依靠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确立了至今“对其他战略力量都占有明显的优势”<sup>57</sup>的安全地位。在生产领域,美国所占的世界 GDP 份额一直在 25% 上下,2010 年依然达 23.6%。在金融领域,美元获得了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的金融结构性权力,为其全球性的结构性权力作了最好不过的注脚。在知识领域,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美国至今依然“在所有高科技领域几乎都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在最关键的信息和通信领域,至少领先欧洲 5 年,领先日本 10 年);美国的科技投入占世界总投入的 40%;美国的科研设施是最先进的。”<sup>58</sup>

以上对现代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的分析表明,脱胎于中世纪欧洲国际体系的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导致了像王国、教会和帝国这样欧洲旧有的基本国际行为体结构性权力的逐步丧失;在欧洲,新出现的异质性基本国际行为体民族国家因而在新型国际体系中逐步获得了自己的结构性权力。这一进程也意味着那些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元在新型国际体系中地位的逐渐彻底丧失。进而言之,在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向全球扩展的三个世纪里,民族国家逐步确立

<sup>52</sup> 本案例主要参考 Thomas D. Lairson, David Skidmore 所著的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wealth*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一书中的第 44—54 页写成。

<sup>53</sup> Thomas D. Lairson, David Skidmor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wealth*,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5.

<sup>54</sup> Thomas D. Lairson, David Skidmor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wealth*,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5.

<sup>55</sup> Ibid., p95.

<sup>56</sup> Ibid.

<sup>57</sup> 朱成虎:《关于当前世界格局的几点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2 期,第 10 页。

<sup>58</sup> 同上,第 9 页。



了自己在全球国际体系中基本单元的地位，从而获得了自己在这一全球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与之相伴的，乃是世界各地现存的各种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像宗主国和藩属国之类基本单元的历史终结——它们纷纷让位于作为新型国际体系基本单元的民族国家。伴随这一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后果，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长期稳定地享有自己的结构性权力。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在安全、生产和金融等基本结构领域和其它次级结构领域中所享有的优势地位，无疑是支撑其长期稳定地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享有结构性权力的重要原因；但是，过去数世纪中西方国家在知识结构领域——知识领域的三个层次包括“信仰（以及由这些信仰衍生的道德观和道德标准），知识和理解，以及信仰、观念、知识的传送渠道”——中所享有的优势地位，恐怕才是支撑其长期稳定地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享有结构性权力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相对而言，以上现代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的案例则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即无论是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中后期德国和苏联/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国际体系或全球国际体系中所分别享有的部分/全面结构性权力优势，它们之间的结构性权力变化都是发生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同质性国际行为体民族国家之间。另一方面，国际体系中同质性国际行为体的持续时间总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频繁为异质性国际行为体所取代，因此一旦确立了自己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元的地位，其所获得的结构性权力就必然持续时间较长和较具稳定性；而在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发生在同质性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则必然更加频繁，因而其所获得的结构性权力所持续的时间则必然相对较短、且稳定性较弱。以上西方非西方、德英/苏美/英美之间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即是明证。再者，相对于知识结构性权力在西方非西方关系中的作用，其在德英/苏美/英美之间的结构性权力变化中虽然也非常重要，但却显然不像在前者的关系中具有那样的决定性作用。

### 结语：后现代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

我们目睹现代“国际体系可能正在进入另一个重要转换过程”。<sup>59</sup>但这是否意味着又一次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由现代国际体系走向后现代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呢？还是如有的学者认为是又一次“国际体系本体仍在延续”<sup>60</sup>的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

当然，由于空间连接和时间连续的原因，我们本来就不应机械地将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二者割裂开来。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各种与民族国家不同的异质性国际行为体（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的出现、并一直在逐步获得自己的结构性权力，现代国际体系变迁开始出现历时性变迁的特性。例如，有人就认为，“权力正在从总统和总理们的手中转移到大公司的董事长和CEO手中，很像宗教改革时期权力从主教和教皇手中向总统和总理手中转移的那个过程”。<sup>61</sup>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无疑正在经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但另一方面，由于当今“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以主权为基本原则、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体系运行仍然是当今的主导形式”，<sup>62</sup>因此完成这种从现代到后现代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完成从前现代到后现代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的漫长过程一样。

有一个变量可能须予以特别地重视，那就是“信息革命”技术。是的，“信息革命”技术重塑国际体系的重要性“可以同曾改变国际政治的书写、纸张、枪炮、印刷机、铁路和电

<sup>59</sup>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24页。

<sup>60</sup>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3页。

<sup>61</sup> 胡泳：《信息、主权与世界新主人》，《读书》，2011年第5期，第120页。

<sup>62</sup>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7页。

报、以及核武器等一系列技术相比肩。”<sup>63</sup>但是，其重塑国际体系在广度、深度和尤其频度方面的重要性，却可能是此前“与之比肩”的技术难望其项背的。<sup>64</sup>结果，结构性权力在与民族国家不同的异质性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扩散，有可能比任何其它历史上的类似扩散都要快得多，从而大大加快由现代到后现代国际体系变迁的进程。

## 简讯

\* 2月29日下午，上海市社联召开2012年学术团体负责人暨党建工作会议。会上，上海欧洲学会荣获“2011年度学会学术活动月优秀组织奖”及“2011年度《社联通讯》‘十佳’学术活动综述”。

\* 3月13日下午，欧盟委员会前对外关系总司副总司长普洪达（Karel Kovanda）大使应邀访问学会，并就当前中欧关系问题与戴炳然、伍贻康、徐明棋、张祖谦、王义桅、张海冰、曹子衡、叶雨茗、杨海峰及秘书处成员进行交流讨论。

\* 3月23日下午，普洪达大使在学会就北约全球化及其对华关系问题，与张祖谦、潘忠歧、王义桅、张沛、李立凡、忻华、曹子衡、杨海峰等座谈交流。

## 欧洲动态（2012年3月1日—2012年3月31日）

### 中欧关系

#### 中英建交40周年（综合外交部网、中新社等媒体消息）

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互致贺电，庆祝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0周年。温家宝在贺电中说，40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英关系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不断向前发展。目前，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臻成熟，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两国相继建立起总理年度会晤、高级别的经济财金对话、战略对话和人文交流机制，在双边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两国关系的民意和利益基础日益加强。卡梅伦在贺电中表示，英中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0年来，双边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今年，英中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将在英国启动，伦敦将举行奥运会，相信这将为两国教育和文化关系迈上新台阶提供独特的机遇，对我们这一代人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意义重大。英方对与中国保持长期密切合作充满期待。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13日在中国驻英使馆举行招待会。刘晓明在致辞时列举了一组能有力说明中英关系跨越式发展的数字：1972年，中英贸易额只有3亿美元，去年达到587亿美元，增长了近200倍。两国双向投资总额从无到有，目前已经超过200亿美元。去年，中国赴英人次为20多万，是1972年的1000倍；1972年中国赴英留学生约100人，去年已达到12万，是1972年的1200倍。40年来，中英建立了总理年度会晤、经济财金对话、战略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四大高层对话机制，几十个双边对话磋商机制，47对友好城市（省

<sup>63</sup>Geoffrey L. Herrera,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Railroad, the Atom Bomb,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199.

<sup>64</sup>例如，有学者认为，“数码信息技术在三大广泛的领域改变了国际政治生活：安全的本质（对个人和国家而言都是一样的），全球政治权威的本质，以及民主和公民权的特点和范围”。参见Geoffrey L. Herrera,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Railroad, the Atom Bomb,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202.

郡)关系。近7年,中英合作建立了19所孔子学院和60间孔子课堂。刘晓明说,中英关系这40年由一系列重大标志性事件形成。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英顺利进行了香港政权交接。2004年5月10日,中英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每一个历史性事件,都记载了中英关系的发展历程,都成为了中英关系的里程碑。

有报道称,中英双方经贸合作在2011年上半年发展势头迅猛,正朝着到201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的新目标迈进。高端制造和基础设施可望成为双边贸易增长点。中小企业合作也将是中英经贸合作中新的亮点。

➤ 人民网3月14日,欧盟委员会13日宣布,将联合美国、日本就中国限制出口包括稀土、钨、钼等在内的17种原材料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诉讼。欧盟方面认为,中国在原材料出口问题上采取了出口配额、出口关税,以及对中国境外企业获得这些原材料提出附加要求等诸多限制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13日表示,为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对稀土的开采、生产和出口各个环节均实施了管理措施,相关措施符合世贸规则。

➤ 中新社3月26日,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26日发表声明,向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梁振英表示祝贺。阿什顿在声明中指出,香港是欧盟重要的合作伙伴。开放、宽容、尊重自由的香港与欧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欧盟十分重视香港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民主发展。阿什顿希望在梁振英的任期内,香港能够繁荣稳定民主,并深化同欧盟的关系。

➤ 证券时报网3月29日,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3月25-29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京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分别与他举行会谈会见,双方宣布建立中爱互惠战略伙伴关系。

## 欧洲政治外交

### 欧盟

➤ 新华网3月15日、人民日报3月16日,根据欧洲刑警组织发布的《2011年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报告,欧洲有组织犯罪正在利用当前的欧债危机与经济危机大行其道、来势汹汹。欧洲议会14日决定成立一个由45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调查黑手党和其他犯罪组织对欧盟合法经济、公共部门和金融系统的渗透情况,评估有组织犯罪的规模及其对欧盟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

➤ 新华网3月24日,为期两天的第五届欧洲地区与城市峰会23日在哥本哈根落下帷幕,欧盟27国代表在会上通过了致力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哥本哈根宣言》。《哥本哈根宣言》为欧洲城市发展设立了明确目标,将致力于使城市发展更加环保,更具社会包容性和经济竞争力。

### 英国

➤ 欧洲时报3月21日,BBC消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3月20日向议会上下两院讲话,纪念登基60年。

➤ 欧洲时报3月22日,英国首相卡梅伦日前发表讲话称,政府正考虑将国内公路网部分私有化,以减少公共资金投入。卡梅伦称,这么做的目的是改善作为基础设施之一的

公路状况，因为英国一些公路网“已数十年没有升级，落后于其他国家”。

➤ 新华社3月23日，英国政府21日在新财年（从今年4月1日开始）预算中宣布对价值200万英镑以上的个人所购豪华住房征收7%的印花税，对企业所购的此类住房征收15%的印花税。这两项税收政策分别从22日和21日起生效。此外，自2013年4月起，在英国拥有价值200万英镑以上住宅类房产的外国企业将需要交纳资本收益税。英国财政部预计，这些改革将在下个财年带来1.5亿英镑的税收收入。

## 法国

➤ 法国中文网3月2日，萨科齐西南部参加竞选活动时，遭到数百名愤怒抗议者围堵，最后他被迫躲入一家咖啡馆中“避难”。

➤ 法国中文网3月5日，萨科齐3日在波尔多发表竞选演说，充满激情地为其“法兰西共和国文明”概念辩护。这个演说的基调很右，与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明显有别。而所有民调都显示奥朗德将获胜。

➤ 法国中文网3月19日，据法新社报道，宪法委员会核查支持签字后，于19日国际标准时间16点30宣布10位候选人正式名单。他们是：57岁的萨科齐；57岁的弗朗索瓦·奥朗德；42岁的玛琳娜·勒庞；60岁的白鲁；60岁的梅朗雄；69岁的爱娃·若利；42岁的娜塔利·阿尔托；52岁的尼古拉·杜蓬-艾尼昂；71岁的雅克·舍弥纳德。

## 德国

➤ 中新社3月2日，德国总统府日前宣布，因经济丑闻被立案调查导致辞职的前总统武尔夫，将获得每年将近20万欧元的“荣誉退休金”。消息一出即在德国社会各界引起争议。多数德国公民认为武尔夫辞职“不名誉”，要求其放弃这项政府补贴。

➤ 综合中新社、《世界报》、《德国之声》3月18日消息，德国联邦大会18日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由社民党、绿党、自民党、基民盟/基社盟等5党联合提名的无党派人士、民权活动家约阿希姆·高克以991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胜利，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第11届总统。高克在德国社会享有较高声誉。高克在致辞中强调自由和责任感的重要性。在政治立场上，高克偏向“左翼、自由保守派”。他曾批评占领华尔街运动，指责对银行的严格监管“非常愚蠢”，赞扬德国央行董事扎拉青公开发表饱受批评的排外主义言论“很有勇气”。有媒体称，高克是默克尔任期内频频更迭的第三位总统，作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无党派的总统，高克的公民权利主张使他的民意基础强大，但仍将受到德国各派政治力量的钳制。高克的当选，虽然一定程度上暴露出默克尔联合政府的脆弱，但作为没有实权的虚位总统，高克与默克尔的合作将不会出现太多障碍。默克尔当天表示，她很高兴看到高克在投票中获得广泛支持，这也是德国政治史上首次出现总理和总统均来自前东德地区的局面，从而表明，德国统一的目标已经实现。

➤ 《德国之声》3月21日，默克尔政府通过财政部长朔伊布勒提出的2013年及中期财政预算方案，德国联邦公共债务削减将超过预定目标。2013年新增借款控制在196亿欧元，支出为3007亿欧元，2014年新增债务额度为103亿欧元，占GDP的0.26%。争取在2016年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结构性赤字不超过0.35%。

## 其他国家

➤ 欧洲时报3月26日，意大利总理蒙蒂25日启程前往亚洲进行巡回访问，首站是韩国，然后是日本和中国。据意大利媒体分析，蒙蒂欲向亚洲人介绍新意大利的魅力，力

图在这一地区与其它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法国一比高低。法新社报道说，蒙蒂意欲加强与这三个国际金融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国家的联系。

➤ 欧洲时报 3 月 27 日，3 月 25 日为希腊独立日。首都雅典和其它城市再次爆发声势浩大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当局被迫取消了原定的阅兵仪式。

## 欧洲经济

### 欧债危机

➤ 中新网 3 月 3 日，欧盟 25 个成员国 2 日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财政契约”，朝着建立财政联盟方向迈出重要一步。援引 BBC 报道，根据“财政契约”中的自动惩罚规定，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将有权对结构性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0.5% 的国家进行处罚，最高金额不超过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1%。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有 25 个签署了这项财政契约，英国和捷克没有签署。欧元区大多国家认为，“财政契约”意味着欧元区朝向更紧密的财经一体化与更有力的经济治理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为解决欧债危机、改善经济增长和实现财政可持续性带来了更好的前景。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签署仪式上说，条约的签署生效将产生深远影响，条约规定的政府间相互监督、以及欧盟机构的惩罚措施将有利于避免主权债务危机重演。德国总理默克尔称，该契约是向一个稳定的政治联盟迈出了一大步。

➤ 中新社 3 月 21 日，希腊议会 21 日投票通过 1300 亿欧元第二轮救助协议实施方案，使希腊暂时避免债务违约的风险。

➤ 中新社 3 月 27 日，由于抵挡不住来自欧元其它国家的压力，德国总理默克尔于 26 日对媒体承认，同意为欧元拯救基金扩容，并表示德国将为此付出更多抵押。默克尔说，欧元稳定机制 ESM 以及它的前任 EFSF 将在几年之内并行，因此德国将为该基金付出的抵押将从原计划的 2110 亿欧元上升到 2800 亿欧元。

## 国际综合

### 核安全峰会（综合中新社、新华网 3 月 27-28 日等媒体消息）

第二届核安全峰会 27 日下午在韩国首尔闭幕，共有全球 53 个国家地区领导人和 4 个国际组织代表与会。本次峰会以加强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为主题，回顾了 2010 年华盛顿峰会以来取得的进展，重点讨论了如何加强核安全措施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核安全峰会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于核安全的认识和关注，扩大了国际社会对于核安全的共识，各国借此交流了核安全领域的经验，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与会各方通过了《首尔公报》。公报内容涉及全球核安全体系、国际原子能机构作用、核材料、放射源、核安全与核能安全、运输安全、防止不法交易、核检查、核安全文化、情报安全、国际合作等 11 个领域，共提出了 13 项非约束力承诺或鼓励措施。《首尔公报》指出，有效保护包括用于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核材料及核能设施，同时防止非国家行为者获取核材料以及相关情报和技术，是各国的根本责任。与此同时，还应切实保障其他放射性物质安全。公报还强调，加强核安全不应损害各国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的权利。在促进国际合作，履行各国核安全责任方面，除发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心作用外，还应进一步发挥地区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公报称，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是全世界的共同目标。与会领导人重申了防止核恐怖的政治意愿和采取

强有力措施、开展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并承诺继续为此作出自发的、实质性的努力。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27 日在峰会上发表了题为《深化合作提高核安全水平》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在核安全领域的政策主张、所做出的努力和重要举措。公报说，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将于 2014 年在荷兰举行。

### 金砖峰会（综合新华网、人民网、国际在线等消息）

29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各国领导人就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金砖国家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达成重要共识，会后发表了《德里宣言》和行动计划。此次峰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在金融合作机制上取得的成果尤为显著。据悉，各国在用本币信贷工具进行贸易方面达成了多项协议，并酝酿成立新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要求各成员国财长研究其可行性并成立联合工作组进一步研究。这是金砖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谋福祉、为全球发展事业作贡献的重要尝试。有专家认为，这将成为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有效补充。

此次峰会上，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成员行共同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边本币授信总协议》和《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协议》，旨在以多边促双边的方式，切实促进金砖国家境内以各国官方货币进行的商品、服务与投资活动。

峰会还在深化金砖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方面形成了一份涵盖财金、经贸、农业、科技、卫生等诸多领域的 17 条行动计划，力求为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合作符合各成员国共同利益，将加强金砖国家合作的经济社会、民意基础，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有力支撑。

在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各国都主张根据国际法准则，通过多边主义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呼吁和平解决有关危机，认为应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通过政治、外交和对话手段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胡锦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加强互利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强调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并就金砖国家未来合作提出 4 点建议：坚持共同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坚持平等协商，深化政治互信；坚持务实合作，夯实合作基础；坚持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发展。

### 欧盟征收航空“碳排放税”

➤ 新华网 3 月 2 日，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 3 月 1 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说，英国已经在 2 月 28 日向本国一些航空公司分配了免费碳排放配额，成为欧盟第一个采取这种行动的国家。根据规定，航空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先分配到一定的免费碳排放额度，在结算时如果排放量超出这个额度，就必须从欧盟碳交易市场购买，如果有节余则可以出售。

➤ 新京报 3 月 12 日，轮值主席国丹麦气候与能源大臣马丁·利德高在 3 月 9 日举行的欧盟环境部长会议上表示，尽管航空碳税法遭到多方反对，甚至有可能遭到贸易报复，欧盟也不会改变征收航空“碳排放税”的政策。

➤ 中新社 3 月 13 日，欧洲空客等 9 家欧洲航空业公司致函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及欧盟主要领导人，呼吁欧盟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强征航空“碳税”带来的损失。9 家欧洲航空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声明中指出，由于多个重要市场继续反对欧盟征收“碳税”，搁置、取消和惩罚性行动会不断加剧，欧洲航空业及相关产业正在面临报复措施。他们呼吁

欧盟能够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寻找“折中方案”，尽量减少强征“碳税”带来的损失。

➤ 人民网3月14日，人民网援引法国《论坛报》12日发表题为“碳税：俄罗斯紧跟中国步伐”的文章称，俄罗斯交通部副部长奥库洛夫表示，俄罗斯计划立法禁止其航空公司向欧盟缴纳航空“碳税”。据悉，2月份，俄罗斯已经对外宣称拟限制欧盟航班飞经西伯利亚上空。

➤ 经济参考报3月19日，为避免欧盟航空“碳税”演变成中美俄等32国与欧盟之间的碳税贸易战，国际民航组织(ICAO)冈萨雷斯16日提出四种可能的机制，以替代欧盟“碳税”计划。包括：强制抵消航空公司碳排放、带有一定创收机制的强制抵消，以及两项限制排放及贸易体系：一项是所有碳排放都可以进行交易，另一项是以初始排放为基准的增减量才可以交易。

➤ 中国商务部网站3月21日，欧盟称不会在航空碳排放税问题上妥协。欧盟气候专员赫泽高(Hedegaard)20日发表讲话称，来自航空业的压力不会左右欧盟的决定，欧盟不会因为可能引起贸易战而在气候立法上做出让步。但欧盟将尝试与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磋商，以期达成控制航空公司碳排放的国际协议。

## 中东北非问题

### 伊朗

➤ 国际在线3月7日，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6日发表声明说，她代表法、德、英、俄、美、中6国愿意与伊朗恢复核谈判，并将尽快确定双方都认为合适的谈判时间与地点。阿什顿在声明中说，她当天已经对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贾利利2月14日给她的谈判邀请信做出答复。阿什顿在给贾利利的回信中说，希望从现在起，伊朗能进入一个持续的、建设性的对话程序，逐步消除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伊朗核问题的担忧。

➤ 国际在线3月8日，援引英国《太阳报》报道，卡梅伦在听取情报官员有关伊朗核计划的简报后称：“显然，伊朗对其所在的整个地区威胁都很大，可能引发核军备竞赛。但是伊朗的危险正在扩散，有迹象显示，伊朗想要开发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我们必须明白，伊朗的这种潜在威胁并不仅仅局限于以色列和中东地区。”卡梅伦再次强调，不排除对伊朗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很关键。他说：“如果制裁不起作用，那么就是作出艰难决定的时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也表示，不排除武力打击伊朗的可能性，但强调应以制裁为主。

➤ 中新网、新京报3月24日，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23日表示，欧盟27国外长22日在布鲁塞尔会议上通过关于再次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新一轮制裁包括限制石油、石油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的贸易，以及冻结伊朗中央银行的资产。

### 叙利亚

➤ 新华网3月3日，欧盟春季峰会3月2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批准了欧盟近日对叙利亚作出的制裁决定，并要求其着手准备对叙利亚的进一步制裁。峰会通过决议，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辞职，为叙“和平过渡”铺平道路；要求叙利亚当局立即停止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力和反人权行动”。决议说，欧盟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为争取自由、尊严、民主所作的斗争；承认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呼吁叙利亚各反对派加强团结，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的“新叙利亚”而抗争。决议重申，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为结束叙国内暴力所作的努力，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叙利亚危机联合国与

东盟联合特使科菲·安南的工作。

➤ 中新网 3 月 11 日,阿拉伯外交人士称,因为担心遭到欧盟国家的驱逐,叙利亚已经开始提前从这些国家召回大使。

➤ 中新社 3 月 11 日,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11 日在对大马士革的访问中第二次会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此次访的核心议题上:停止暴力、人道准入和开启政治对话。安南向阿萨德提出了能够实质影响当前局势并有助终止这场危机的若干建议。

➤ 中新网 3 月 13 日,叙利亚大使哈缪 12 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说:“这场危机不是由和平示威或者要求改革而引发的。这场危机是受那些热衷折磨叙利亚、发动媒体战并向我们的人民施加经济制裁的外部团伙的影响所引发的。”他称,“外部团伙”正在为叙利亚国内危机火上浇油,他们企图分裂这个中东国家。

➤ 新华社 3 月 15 日,在叙利亚爆发反政府游行一周年之际,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及各省市 15 日举行百万人大游行活动,游行民众高举叙利亚国旗和总统巴沙尔的画像,高呼“支持改革”、“拒绝外部干涉”等口号,对政府的改革计划表示支持。据叙利亚电视台报道,叙利亚青年组织通过社交网站、电台、电视台呼吁并组织这次名为“为了叙利亚世界大游行”的活动。

➤ 中新网、新京报 3 月 24 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欧盟已将叙利亚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 150 名代表列入禁止入境黑名单,其中包括叙利亚国有航空公司和中央银行。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巴沙尔 36 岁的妻子阿斯玛和其他家族成员被欧盟列入禁止入境黑名单,她们在欧洲的财产也被冻结。

➤ 人民网 3 月 27 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卢卡舍维奇 27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将不参加 4 月 1 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叙利亚之友”会议。卢卡舍维奇表示,虽然俄方收到了邀请,但是拒绝参加,因为这类会议并不致力于恢复叙利亚各派别之间对话,而是准备从外部干涉叙利亚事务。

➤ 人民日报 3 月 30 日,第 23 届东盟首脑会议 3 月 29 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召开,共有包括 10 国元首在内的 21 个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与会,叙利亚被排除在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专程出席会议。此次会议是伊拉克 22 年来第一次举办东盟峰会。与会各国领导人决定,将于明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第 24 届东盟峰会。叙利亚问题是此次峰会的重点。会后发布的《巴格达宣言》没有包括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的内容。《巴格达宣言》指出:将充分支持叙利亚人民对于自由、民主以及美好未来的合法追求,谴责暴力、屠杀和血腥镇压的行为,坚持通过对话和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这是为了维护叙利亚的国家完整和人民的安全,支持和维护东盟对这一事态做出的决议,支持联合国和东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所担负的使命。首脑会议还讨论了东盟内部改革、阿拉伯国家经济整合和互补等问题。

## 其他

➤ 中新网 3 月 6 日,援引俄新网 5 日报道,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对 100% 选票的统计结果,“统一俄罗斯”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普京得票率 63.60%,赢得大选胜利。

➤ 欧洲时报 3 月 13 日,第六届世界水资源论坛 12 日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马赛开幕。来自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5 万名代表围绕“治水兴水,时不我待”主题展开研讨和交流,共同为世界水问题的解决作出努力。据悉,国际社会的短期任务是到 2015 年将无



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减少一半，长期任务是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安全饮用水。